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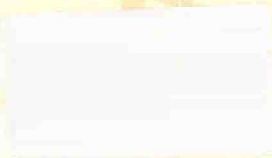
國家民族問題研究中心資助
中央民族大學「111工程」三期建設項目
台灣南島語民族研究叢書

台灣 *Amis* 語 語料的解讀与分析

◎ 林登仙 / 編著

◎ 曾思奇 / 译注

吉屋



Amis

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资助
中央民族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
台湾南岛语民族研究丛书

台湾 Amis 语 语料的解读与分析

◎ 林登仙 / 编著

◎ 曾思奇 / 译注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台湾 Amis 语语料的解读与分析 / 林登仙编著, 曾思奇译注.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2. 6

(台湾南岛语民族研究丛书)

ISBN 978-7-5660-0201-3

I. ①台… II. ①林…②曾… III. ①高山语—研究 IV. ①H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76723 号

台湾 Amis 语语料的解读与分析

编 著 林登仙

译 注 曾思奇

责任编辑 戴佩丽

封面设计 布拉格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8.25

字 数 356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60-0201-3

定 价 5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央民族大学“211工程”学术出版物编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陈 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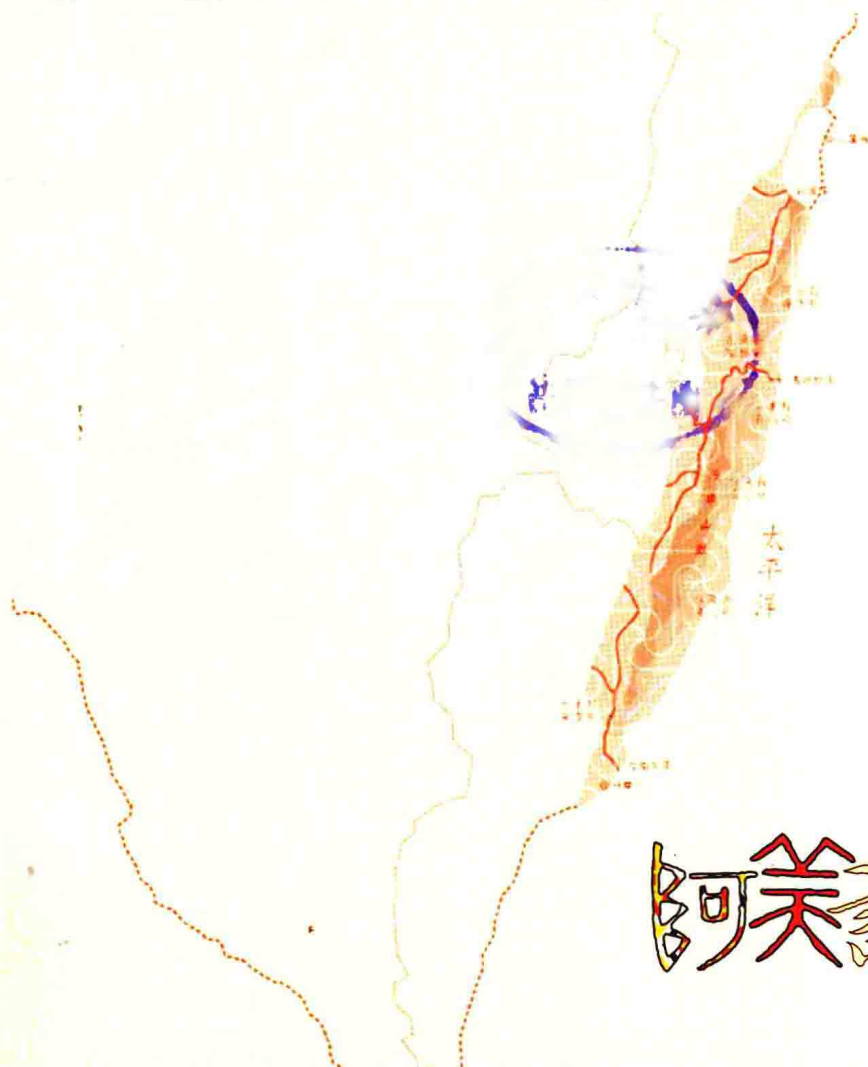
副主任委员：郭卫平

委 员：王钟翰 施正一 牟钟鉴 戴庆厦 杨圣敏 文日焕
刘永佶 李魁正 朱雄全 宋才发 冯金朝 邓小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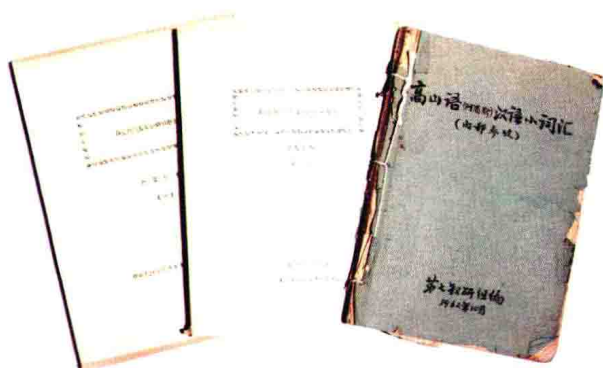
《台湾南岛语民族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编：曾思奇

编 委：曾思奇 石滢富 杨 梅 周 翔 陈金结



阿美語 Am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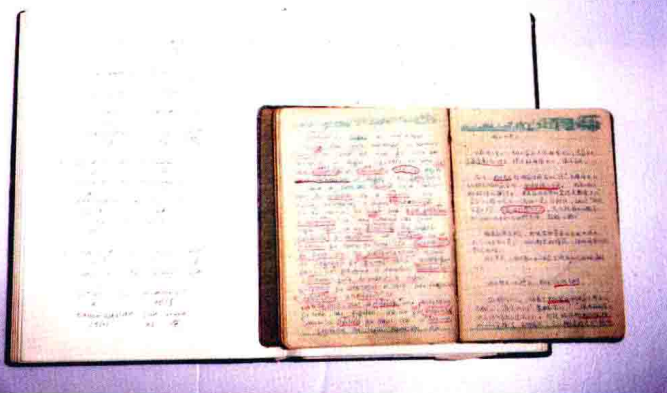


林老师编写的民族语
讲读教材 (1985 年)

(曾思奇提供)

林老师参加编写的民
歌和翻译作品等 (1986 年)

(曾思奇提供)



年 月
课 文

idiahu iranj muja vijuetan duja mimi-
ngaj a 'alu, ira a maru' gnia dadusaj a
maramudaj. bidajian ga talimajan, zishui she
ga totahian. uvumiahl mituding zamira u
hlaklaja midabihl du dilu.

ira a rumiahl taadled gu zikkal, ngahj
gu biduklud naiva dudiku isalawagan nu'alu.
daku tesi'sa gu fuding inamamum, hidebu
sa zamira inamum nizeped duja fuding.
gawra uja dingalawaj a namum manguda,
awadu a maraw gu maamaan, udlangan
u dabangajaj a humi gu segalnngung sa-
naj a madengil, guqi'sa zamira dadusa.
uja mozebedaj a fuding masabotaw^{du}ga-

林老师手迹

(林华提供)



林老师故里——Piyuhu
部落的柱石标记（2010年）

（陈金结提供）

林老师少年时代的
故居（201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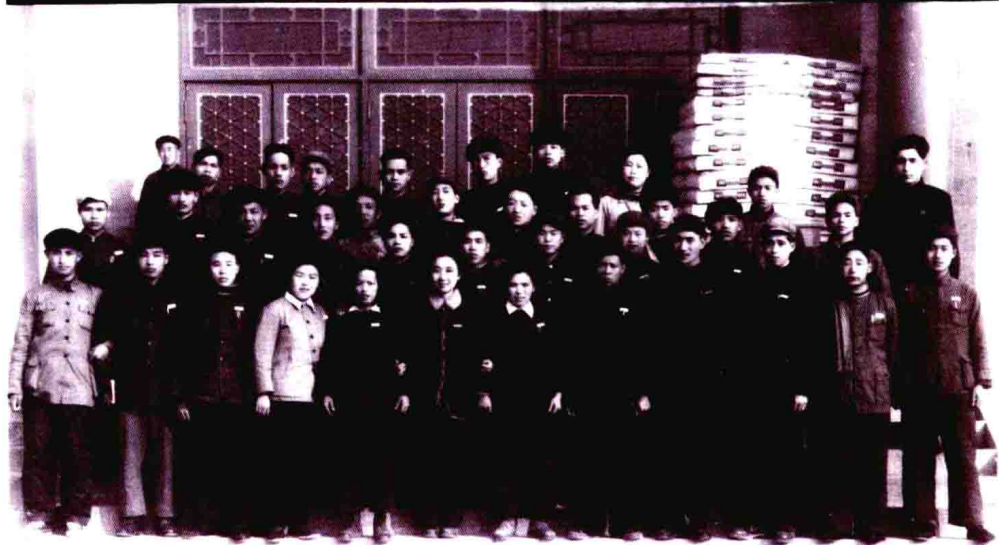
（陈金结提供）



林老师与解放军战友合影。后排左一为林老师（1951年）

（林华提供）

中央民族學院預科第四班全體師生合影紀念 1954年 2月1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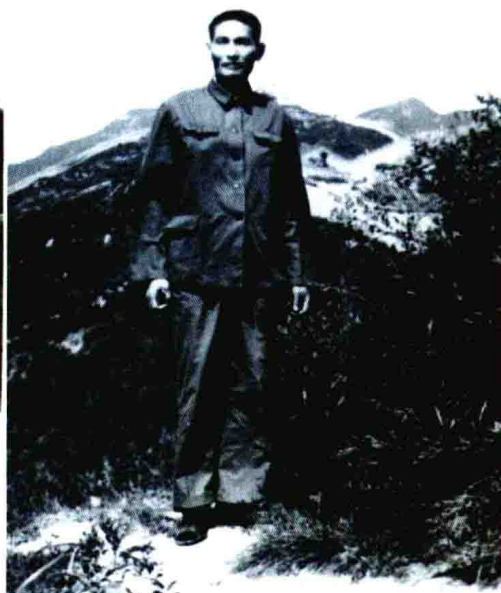


林老师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预科部进修时的师生合影。二排左二为林老师（1954年，林华提供）



林老师（右二）与系主任马学良教授（右一）以及教研室主任何如芬讲师（右四）、陈玉舜（右三）等老师合作记音（1953年）

（林华提供）



林老师在湖北潜江县沙洋地区“五七”干校（1971年）

（林华提供）



林老师和他的女儿林华
在天安门前合影（1980年）

（林华提供）

下图：

林老师参加1986年度
于乌鲁木齐举办的全国少数
民族运动会。后排左四为林
老师

（林华提供）

北京天安门留念

大北疆歌 1980



林登仙老师印象 （代序）

曾思奇

林登仙老师是我大学时代阿美语（民族语）的专职教师之一。从入学那天起，林老师同我们同学之间的教学关系颇有些特别：林老师从没有给我们正式上过课，包括规定的专业辅导课，课程表“任课教师”一栏，一直没有林老师的名字。可是，令人难以置信，我们的民族语教材，包括讲读及语料参考等，基本上或大部分是林老师编写的；还有，我们不时翻检的民族语“工具书”（小词汇本），也出自林老师之手。如果课文出现句子或语法不懂的地方，教研室分工教研工作的副主任何汝芬老师，必定举荐林老师作答。确切地说，我们一开始就是通过民族语教研成果（教材、语料和辞书等）和“分外”的辅导课去认知林老师，而且这种认知愈久弥新，越来越深刻。

林老师为人处世极见谨慎，在我印象中，几乎除教研室既定专业以外的事情，他极少涉足。校外社会公益，多是“台联”、“台盟”等单位组织的群体活动，例如节庆座谈、联欢、参观等，其它的似乎也抱置身事外的态度，遑论臧否人物，褒贬时政。我从未听见他对家乡和家事的谈论，也极少提及自己需要求助的难题。总之，林老师的常态给我的印象是沉默呀沉默，沉默得实在有点严峻。不过，林老师对教研工作很上心，倾注热情和努力，锲而不舍，表现出一种坚韧的担当精神和责任感，往往言之必行，行之必果，一以贯之，始终如一。这些表现似乎与其常态适成对照。此外，林老师喜欢晨练长跑，在学校操场或周边的田间小路上，时常能目睹他长跑的情景。让人感到他矫健的身姿和跑步的律动，传递着一种阿美族青年竞走争雄古俗的壮美和魅力。

初上大学，我只知道林老师是来自台湾的阿美族人。族语地道娴熟自不待言，还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汉语文水平也不错，无论听说读写都很流畅。不过，对林老师的身世经历，不论他本人还是周围的人，多少都有所讳言。我对林老师印象的累积，多多少少是来自人们不经意间点点滴滴的介绍。其实，林老师的履历生命主要包括两个阶段：21岁是个“坎儿”，之前一直在家乡，之后辗转来大陆。他的家乡在台湾东海岸一个叫Turik（都历）部落的Piyuhu（小马）聚落，西屏中央山脉，东临太平洋，是个山海形胜

独秀、渔猎农耕文化特色浓郁的阿美族聚集区。林老师自幼在家乡接受阿美族传统文化教育和熏陶，一面在日本人经办的“公学校”就读，21岁已长成渔猎农耕技能出类拔萃的知识青年。林老师原来名字不是“林登仙”，林登仙是到大陆后的更名。林老师的族语名 ci-Tasang。Tasang 林老师自译“达桑”，实为“他山”也，虽然取之日语借词，溯源乃中国古语“他山之玉，可以攻错”之意。以“他山”自勉，不忘祖训，修身励志，由此可见林老师少年壮志胸襟不俗。

1947年时年21岁，林老师遭逢有生以来第一次山崩海啸般的突变。他来不及回头向自己的家乡和亲人道别，即被时代的“大江大海”（龙应台语）所裹挟来到陌生而动乱的大陆，随后加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一路南征，驰骋大半个中国，抵湖北，在荆州军分区司令部任警卫员。两年后，奉调上海参加“台湾干部训练团”。本是人生峰回路转之际，岂料情势骤变“训练团”无疾而终。林老师又面临山重水复的“关卡”。也许是吉人天相，1952年林老师被保送中央民族学院预科部进修汉语文。适值1954年该院语文系筹建“高山族”语文教研室暨“高山族”语文专业（本科），遂受命参加筹建工作。1956年高山族语文教研室宣告成立，林老师也就正式调入教研室担任民族语（阿美语）专职教师，时年30岁。就这样，这位曾经的集渔、猎、耕、战于一身的台湾阿美族优秀青年，几经颠簸辗转、风雨洗礼之后，终成为一名从事民族母语教学和研究的学者，并在这个岗位上坚守和奋斗了33个春秋。林老师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这是他履历生命中最期待的“归宿”。他始终是怀着“宿命”和“使命”交错叠合的复杂情怀，盘桓、行进在这崎岖而悠远的族语研究的征途上……

1959年秋，中央民族学院“高山族”语文本科专业开班招生。首届9名学员来自北京、河北和福建等地区，都是20岁上下的青年，对这个新兴专业既好奇又向往，学习的积极性很高。民族语是专业必修课，修业期间要求掌握阿美语、布农语等两门民族语言，其中阿美语安排5个学期，修业课目包括会话、讲读和语法等。鉴于海峡“两岸”时处分隔对峙的情势，我们不可能到台湾民族地区实习和田野调查，况且内地有关的台湾南岛语专业参考图书不多，有些重要图书文献（如英文、日文、荷兰文等文献）因保密严控借阅等等诸多原因，我们普遍要求加强加深族语教学，以弥补以上客观因素造成的缺欠与不足。因此，作为强化民族语教学，培养师生独立研究能力的必要措施，从第2学期提前开设族语讲读和语法分析等课程。讲读课的要求相当严格，课文以本族的口传文学传说为主，佐以他族民间文学及其它题材的译文；语法分析同样要求提供尽可能多的语料作为课外参考读物。这些课文和参考资料，一般篇幅长，数量多，难度较大，编撰工作包括搜集、编辑和编写等琐碎、繁杂又艰巨的任务。而这些重担，自然落到年轻有为的林老师肩上。这期间，林老师到底编撰多少教材和语料？已无当年的存档记录可查考。在我的记忆中，每隔三天或一周，就有篇幅不短的族语讲义或参考资料发到课桌上。16开幅的讲义，呈浅灰色，纸质既糙又薄，散发出一股油墨的清香。这个印象

一直存留在我的脑海里，从学生时代到现在未曾忘却。可惜这些宝贵的资料都在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浩劫中散失殆尽，教研室片纸不存。我这里保存的部分族语讲义，少说也有半个世纪的岁月，多已纸质脆薄经不起翻检。还有部分散失的教材，所幸有当年的笔记以为参照复原。即使仅凭这些已近乎“文物”的旧讲义、旧笔记重新加以整理，也仍可窥见林老师编撰的族语教材及语料，工程之浩大实在难以数字统计！

林老师负责的工作远不止“编撰”一项，可以说，他在这项工程中“一身二任”，不辞劳苦。既是教材书稿撰写修改书稿的实际作者，又是统揽书稿校订、印制、分发等事务性工作的“义工”。每一篇教材从手稿状态送到印刷厂油印，继而校对、修改、审订，乃至成讲义这样的产品状态，最后完完整整地分发到学生课桌上，每一道工序和环节，都是林老师亲手亲为，做得殷勤周详，一丝不苟，实在令人感佩。

只要设身处地回想一下林老师当年的工作背景是在政治挂帅下的“文革”前后。既不计工作量，不计酬劳，也丝毫没有跟所谓的职称、加薪、福利待遇或什么荣誉等等“挂钩”，甚至于上级领导视而不见，更有甚者视如敝屣弃之唯恐不及，或者给你扣上“只专不红”、“冲击政治”的大帽子。恰恰在如此不堪的境况下，林老师仍以事业、专业为重，自觉担当，持之以恒，孜孜不倦，做出成绩而不张扬。这样的思想境界和奉献精神，即使在同辈人中恐怕也难有望其项背者！

现在人们很难想象林老师当年编写教材的条件是何等不易：配给的稿纸杯水车薪，林老师就搜罗废弃的旧讲义，一页一页翻转过来，利用其背面撰写阿美语课文。甚而为了最大限度的节约，一般 400 字/页规格的篇幅，林老师手稿至少扩容到 800 字/页。我曾见到林老师的手稿：用拉丁文字转写阿美语，一行一行，密集有序，清晰可见。流畅工整的字迹，用蓝黑墨水书写的是阿美语，偶见红墨水书写的是修订文字，间或有铅笔点划勾勒的符号，可能是审读者留下的商榷或修改“意见”。我还见到 1962 年油印出版的“小词汇本”，初稿同样是用废弃的讲义纸裁制的一张张长方形的卡片。卡片背面写有拉丁文字转写的阿美语词汇和中文解释的文字，一张一词，极为严整。“文革”后，在林老师存放卡片的木盒里，我发现除旧讲义裁制的卡片外，还有用领袖语录卡改制的词语卡片，显然是林老师后来增订的新词。那些语录卡可能是林老师“文革”期间搜集备用的。说真的，当我亲眼看到林老师手写的这些旧书稿和词语卡片时，联想到老师的族语研究竟是如此用心良苦，有一种五味杂陈顿涌心头的感觉，苍凉嗟叹之余，只剩下酸涩的虚无了。

回想我在学的时候，何汝芬老师经常这样叮嘱：“民族语有问题，请教林老师，一定有收获！”开始问题少，请教也少。后来随着功课增多，请教越发频繁，他的“分外”辅导课也就约定俗成沿袭下来。林老师的辅导别具一格：先要求列出问题清单，并初步归类，然后按照问题类型预约辅导讨论的时间。一般一个专题安排 1-2 次/周，有的要连续几周才能结题。结题后有一次例行的总结。林老师不仅辅导方式与众不同，而且辅导

内容尤其值得称道，充实、丰富、严谨，从无妄言、诳语、敷衍、卖弄、瞒天过海，而是言之有物，见微知著，触类旁通，使学者在求真求实中解惑释疑。

辅导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林老师分析的入微和创见，语不惊人，却鞭辟入理，振聋发聩。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第一节辅导课，林老师开宗明义阐述“阿美语是阿美语”的命题。他说，有说阿美语（包括台湾的其他的南岛语系的民族语言）是台湾“番语”，是“高砂族语”，是“高山族语”，还有说阿美语和汉语某种方言比如闽南话可能是一家。他认为这是“拙劣的童话和学术陷阱”！林老师严正地说：“阿美语就是阿美语，这是我们要面对的、不容辩驳的真理性事实。”他说，我们学阿美语，第一要旨是对其真相及其本质的认识和把握，不然，就会闭目塞听，或盲人骑瞎马掉到“陷阱”里去了。林老师一再申明他答题以“我知我用”为理据。“我知我用”这四个字，也很有认知语言学和实用语言学理论的雄辩意味。林老师很自谦地将他的答疑归纳为三类：可以语言学回答的；语言学不能回答，可借助语言学以外的人文科学（如历史学、文化学等）提供参考答案的。还有一类，是包括语言学和其它所有学科无能回答的，只有皈依“原生地”去找回解题的金钥匙。他说：“第一类是我所努力的，第二类是我所勉为其难的。最后一类回归原生地才是所渴望的，包括我和你们。”那么，“原生地”在何方？他说，就是阿美语人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那里有我们迫切需要的阿美语宝库和阿美语老师——知识渊博的族老乡贤。林老师语重心长地说：“希望等到这一天，我和你们一起到台湾阿美语地区去体验，去感受，去调查研究，共同找回那把金钥匙！”这些话过去当老师的谦辞或对学生的勉励和期望来理解，随着阅历的增长才越发领悟到其中的深意，这里有老师的值得回味的胸中块垒，还有即使今天仍不失为真知灼见的学识。

我 1963 年毕业后留校在教研室任助教，原以为会有更多同林老师交流的机会，没想到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接踵而至，愈演愈烈，彼此竟有如咫尺天涯，专业研究几成无望的奢愿。1963 年底，我奉命到云南文山州广南县北极公社和掰坡公社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劳动锻炼。一年后返校，听说林老师已到外地参加“四清”运动去了。不久，我奉命参加由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宗群、彭华庵领导的“延安民族学院院史调查组”，跟时任历史系助教的李清和先生一起，到陕西、内蒙、甘肃、宁夏等地采访调查。接着，是长达 10 年的“文革”运动以及湖北潜江县沙洋地区“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和“兴无灭资”的思想改造。1971 年我从干校调回福建，先后在平和县崎岭公社中学、漳州龙溪地区中学教师进修学院、漳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和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等单位工作。我和林老师再度相聚共事，已经是大学毕业 20 年后的 1983 年了。此时林老师已经评上讲师职称了。后来，我们一起参加国家民委主持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的研究课题，共同承担阿美语（时称阿眉斯语）简志的编写任务。1985 年经国家民委批准，我们学校招收新一届的“高山族语言文学专业”大专班，学生都是内地的台籍子弟，其中有阿美族 2 人、泰雅族 1 人。民族语按三个不同语种（阿美语、布农语、排湾语）分

班授课。教研室同仁都忙着各自的教学任务。既定的阿美语及辅导课的任课老师，仍没有安排林老师。不过，这时期的教研环境比“文革”前相对宽松，林老师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讲读教材的编写和修订。万幸的是，原由他执笔的《高山族阿眉斯语讲读教材》，修订后于 1985 年正式出版，出版物的封面上第一次署上他的名字：林登仙。这毕竟是一件令人宽慰的事，我借此鼓励他去申请高级职称。林老师默然良久，答曰：“这本来是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做了，固然明白自己所做的，难道要通融别人来认可和评判呢？”从此以后，林老师一直没有去承领申报高级职称的表格，也始终没有在那上面留下一个字。

一些认识或不认识林老师的人问我林老师是什么样的人。我觉得林老师平生做了两件好事：一件是参加祖国大陆的人民解放事业，并真枪实弹地为这个事业去流血战斗；另一件是参加中央民族大学台湾南岛语系民族语言文学教研事业的创建，竭尽筚路蓝缕之劳。前一件是汪洋大海的轰轰烈烈，他是沧海一粟；后一件是兀然崛起的殿堂擎柱，他是奠基的基础石。这两件虽说是凡人凡事，没有显赫的、炫目的功绩和影响力，但对因缘际会而有红楼未完之憾的林老师，却有着怎样刻骨铭心的非凡意义；也使局外的常人从中感受到林老师平凡中有伟大、澹泊处见高尚的精神与品格。

古人云：百年沧桑，世事沉浮，悠然苍天，人生达命。个中冷暖自知，是非任人评说。林老师一生命运乖舛，多有坎坷，或诸事不遂。但林老师把事业和专业一直视如生命和信仰，这是他毕生永续不断的圣情。他为此二者几乎奉献了一切。

作为林老师的学生和同事，求学和共事的长期经历告诉我：林老师是一位平凡而不平庸且有抱负的人，是一位朴拙、稳忍、诚信而胸无城府的人，是一位敬业、实干、奉献而不投机取巧的人，是一位对国家、民族、家庭，对神明、祖先、亲友和世人无不感恩戴德的人。林老师是永远值得敬仰和缅怀的台湾阿美族学者！他不是丰碑，但绝对是楷模。唯其如此，让我们晚辈对老师永远高山仰止。

逝者如斯，肃然自远。适值林老师仙逝 23 周年之际，我们整理出版了他的部分族语作品，自然期望林老师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业绩和精神，当如薪火生生不息，光照着后来者孑立前行的足印，渐行渐远，达到理想的境界！

2011 年 6 月 28 日

圣土与骑士

——为一篇序言所写的文字

林 华

这个题目很奇怪，似乎裹挟了浓重的欧洲中世纪黯淡沉重的色彩与影子。其实不然，它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命题，一个关于国家与爱国者的十二万分严肃认真的命题。主题严肃，内容严肃，结论严肃，并且充满着人文精神的光芒。

把祖国比喻为“圣土”，把爱国者比喻为“骑士”，似乎并不多见，在我也是第一次如此立意和定位。这种说法，是借用了汉语类比手法的启示，但却完全通俗易懂，“圣土”就是指一方圣洁美丽的国土，“骑士”就是指为她尽忠职守的臣民。只不过“圣土与骑士”的称谓法，舶来品的味道确实浓了些，是体现了另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化元素的内涵与外延的延伸。特别是一提起“骑士”，人们自然而然联想到的是欧洲中世纪最著名的，那个大战风车的骑士先圣——唐吉珂德的故事。其实，唐吉珂德的人生，就是一部英雄主义的史诗，用今天雷人的流行语说：唐氏是一位不折不扣，悲剧色彩浓重的爱国者。我以为现在是二十一世纪，文化的中西贯通，也适应于上层建筑领域。祖国与爱国，爱国与奉献，是人类共有的美好情感，为什么不可以发散一下思维，借鉴不同称谓来阐释相同的问题和道理呢。因此，我还是很郑重地写下了这个题目，并倾注了以下的文字。

之所以这样立论，是基于以下几种考虑：首先，我个人风格不喜欢从众，大家都这样说时，我就要换一种说法了；其次是，我以为这样的比喻很合适恰当，不会产生什么歧义。祖国是一个神圣而崇高的概念，一种神圣而崇高的信仰和情感。祖国的土地难道不就是圣土吗？我还想把祖国比喻成圣殿呢！是国土的圣殿，也是心灵的圣殿。至于说到爱国者是骑士，我以为更没有什么标新立异了。即使是那个大战风车的有些癫狂的骑士之王——唐吉珂德，也是很光荣而勇武的。因为，他的执著，他的傲骨，他的献身精神，不正是从古至今，中国一代代知识分子命运和奋斗史的真实写照吗？，那就是为大

爱燃烧自我，为大爱奉献一切！“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只可惜，“骑士”一词的起源，的确不是中国本土的东西，然而，又何妨不能借来一用呢？

这是一篇为完成一本书而写的序言。书是一本上一个世纪 60 年代编写的台湾阿美语讲读教材，作者是我的父亲，而编者是曾思奇教授，他的学生。如果没有这本书的发起者曾思奇老师，这篇序言是不存在的。正值中央民族大学建校 60 周年庆典，我愿以此拙文，祝福母校甲子之岁生日快乐！祝福中央民大事业发达，人才辈出，再创新的辉煌。

曾思奇教授，是中央民大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南岛语教研室博士生导师，是大陆从事台湾少数民族研究的知名专家，主攻民族语言研究，兼涉历史、文化、教育与社会现状等方面。他是中央民大高山语教研室（现为南岛语教研室）成立后，在文革前招收的唯一一批全日制本科台湾高山语专业的 9 个学生中的一个，是毕业后从事专业研究的两个学生之一。曾老师从事台湾少数民族语言学研究已经近 40 年。从一个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的知识青年走到老年的岁月，经过“四清”运动、下放“五·七”干校，“文革”十二年的改行，到改革开放后恢复教研室工作，出版学术著作等身，培养出了几十名硕士生、博士生，曾老师可谓是功成名就。然而，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喜忧参半的苦乐人生体验，怕是只有曾老师自己可以说得清楚。

如今，曾老师已年过七旬，退休在即，要彻底告别教学第一线，离开他热爱的讲台和学生了。面对南岛语研究后继乏人的窘困现状，他的心情很复杂，很沉重。然而，在退休前，他最后要做的一件事，竟然是出版我父亲编写的讲读教材，那是他在上世纪 60 年代初当学生时讲义和亲手抄下的阿美语讲读课本的笔记资料。是什么驱使他要这样做呢？！我在心底默默地叩问自己。这样一件费力不得好的辛苦之事，为什么一定要去完成呢？结论自然是清晰的，从中我看到了曾老师的一腔悠悠报国情，一颗拳拳赤子心！

当我第一次听到曾老师谈到要为我父亲出书的想法，并希望我也写一篇序言的时候，我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为了一千个、一万个没想到，为了这迟到了二十余年的拨云见天，为了我父亲在九泉之下的含泪一笑，为了在这之前的许多年里，我实际是对曾老师有诸多误解甚至误会的，我泪流了。还为了什么呢？！我想说就为了这无语的感恩，无语的欣慰，无语的叩拜吧！

曾思奇老师，论师承关系，他可以说是我父亲的一个学生。虽然，我刚刚知道我的父亲，并非在课堂上向他传授了许多阿美语知识，而是在课下给了曾老师一些专业上的指导。然而，他们的师生情谊很深，并一直延续至今。尽管，我父亲已经去世二十三年

了，他不复知道曾老师在这二十三年里，在学术研究及教学科研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绩，然而，他始终非常欣慰，当年他是极力举荐把曾老师从福建调回北京工作的力荐者之一。而曾老师这些年里，也一直对我父亲心怀感谢、尊重和怀念。对于前者就是父亲力荐曾老师一事，我是知道的，而对于后者我是通过这件事才了解到的。我内心深处，对曾老师的肃然起敬，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

我与曾老师，因了我父亲的缘故，相识也有三十余年了；也因了我父亲早逝的缘故，二十多年间基本没有来往。近年来开始有少许接触，却是缘于一次误解，后来是兴师问罪而去，欣喜谅解而归。几年前，从校园网上看到一则南岛语教研室与台湾中央研究院原住民研究大陆访问团进行学术交流的通讯报道，里面谈到南岛语教研室的历史沿革问题，我认为有与历史事实不符的地方，就忍不住跑去，找到曾老师表示“抗议”。记得，当时曾老师的确有些诧异，可能是我的勇气让他吃了一惊吧。他把我约到办公楼转角的僻静处，认真向我解释了这件事。是研究生写的，发稿前也没有交他审读。他表示歉意。接着，他把我带到教研室，给我看了这些年教研室的科研成果，并把他的本语言学专著，还有一本《台湾少数民族文化概论》送我拜读。我当时的感触就是我一定是误会曾老师了。因为，他的道歉是那样诚恳，我与他的谈话从开始时的有些紧张，到后来竟然冒出了许多相同的意见和看法，这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并且他送的书还是我非常需要的，这又是另一大收获。当我离开曾老师的办公室时，心情竟突然变得格外舒畅起来了……

与曾老师更多的接触，是始于2010年年底。他和我均被推荐为国家民委台湾少数民族研究会的常务理事，赴厦门参加了第二届代表大会的换届选举工作。会议期间，曾老师给我讲述了许多陈年往事，都是我一直想听没有听到过的。比如，南岛语教研室的历史发展沿革，他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科研工作及台湾学者对他的首肯，十几年带研究生的艰辛和对学科建设后继乏人的忧患，等等；谈的更多的是一些有关我父亲的一段段往事。这些事在我看来，真可以说是一次深刻的人生教育的大洗礼。特别是涉及到我父亲的教学科研活动，如果不是曾老师亲口告诉我，我是永远不会了解到的。他说：你父亲真是太可惜了！如果论专业水平，他当属第一，可是他的职称始终很低。曾老师说他很替我父亲打抱不平，曾经担心我父亲会有思想负担，想给他宽宽心，可是他自己却从中深受教育了。曾老师对我说：林华，你知道不知道你父亲是怎么回答我的？我说不知道呀！他说你父亲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至今难忘。他说：“我们自己评自己好了，心里明白就行了，上不上都没有关系的。”

一句非常质朴的话语，却令人辛酸到想要落泪。而更令人心痛的是，曾老师讲我父亲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走上讲台，他因为群众的身份不能亲自授课，只能将他掌握的民族语知识转授给可以上课的另一位教员来完成教学任务，而全部的教材等教学文本还需亲自编写，提供出来。即使改革开放后，又招收了一批大专学生，依然只是象征性地安排他上了几次辅导课。当我第一次听到父亲这样的遭遇时，我的第一反应不是愤怒和忧伤，而是深深地悲哀。我的眼前浮现的是父亲几十年如一日，无怨无悔地埋头科研的那个后来日渐衰老并终于陨灭了的身影。

我知道这样的境遇，对于那个年代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对于非常敏感的两岸关系而言，这种悲哀或许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我只有一个父亲，父亲只有一次人生，在四十年完全隔绝的封闭环境下，他在做着一件如此艰苦却又几乎没有任何既得利益可以获取的研究工作，这是人性，是人的心灵所难以承受的，然而，我的父亲承受了，并且无怨无悔。想到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悲剧，抱怨和愤懑都于事无补，我除了沉默似乎只能无语到无言了。然而，我只有一个父亲，并且他早已作古，他已经不能感受那份痛入骨髓的隐痛哀伤，而我却将灵魂不安了，将要在余生里独自饮尽这份悲凉了。

我的父亲是这样一种状况，曾老师的学术人生又怎样呢？当然无疑他是成功的。几十年的默默耕耘、埋头研读著书立说，让他收获了引以自豪的业绩和殊荣。曾老师已出版学术著作 22 部（含 3 部合著），发表论文 60 余篇，有 10 部著作荣获部委级奖项；其中 3 部专业著作，《台湾阿眉斯语语法》、《阿美族母语会话句型》、《Isbukun 布农语构词法研究》，在台湾荣获教育部颁发的“原住民族语言、文化研究论著与教材”等学术奖项。他的研究成果，大多具有填补该研究领域空白的学术意义，受到两岸学术界尤其是台湾少数民族知识界的高度评价。2002 年 5 月，他第一次赴台调研，访问了台北、花莲、台东、屏东、台南等民族地区；2006 年 5 月至 8 月、2007 年 6 月和 2009 年 10 月至 11 月，又三次担任中央研究院的访问学者，参加该院语言学研究所主持的重要课题“台湾南岛语数位典藏研究”项目。从 1959 年入学中央民族学院攻读南岛语专业，到 2006 年登陆台湾调研，历时 47 年。时空运转，他的学术研究终于开花结果，贡献于社会了，为他的人生大爱收获了一份沉甸甸的、绚丽多彩的成果。

然而，他内心深处的幸福指数有多高呢？他是否就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享受学术光环的照耀了呢？在我看来，他得到的更多的是忧患哀痛，更多的无奈和放手，方才平复了那一份苦涩和爱恨交织的企盼了。曾老师曾不无遗憾地说：“像南岛语这样一种重要的语言，而且处于两岸要正常交往的历史时期，本应具有重要的学术文化价值与政治意